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古巴飛彈危機：外交信息傳遞觀點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 Diplomatic Signaling Perspective

doi:10.30390/ISC.201112_50(4).0002

問題與研究, 50(4), 2011

Issues & Studies, 50(4), 2011

作者/Author：賽明成(Ming-Chen Shai)

頁數/Page：31-6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112_50\(4\).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112_50(4).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古巴飛彈危機：外交信息傳遞觀點

賽 明 成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被視為冷戰時期中最危險的古巴飛彈危機事件，持續吸引學者的研究興趣長達近半個世紀。特別是 Kennedy 白宮錄音帶此新證據之解密，對研究者而言呈現出重要的洞見暨困惑。儘管如此，鮮少研究透過外交信息傳遞之面向來探究此一歷史事件。信息傳遞此一針對國際危機解決之途徑認為，當面對國際衝突時，國家會傳達其對手具外交標的之「語言」與「非語言」信息。就某種意義而論，決策者釋出之每一個信息與反信息，均意謂其自身策略性之意圖與關乎對手信息之反應。本文透過國際情境、菁英決策，以及外交信息傳遞等三個面向，針對古巴飛彈危機期間所發生的事件作出分析。本研究指出：美國政治菁英以一種「集體迷思」的方式互動，並從中理解情境因素、解譯蘇聯的外交信息及作出信息傳遞之決定以因應對手競爭性行為。最後，研究發現指出外交信息傳遞對於解決國際衝突之重要意涵。

關鍵詞：古巴飛彈危機、外交信息傳遞、國際情境、菁英決策、集體迷思

* * *

壹、前 言

2008 年 8 月 7 日喬治亞對南奧塞提亞自治區 (South Ossetia) 發動無預警入侵，翌日俄羅斯對喬治亞發動攻擊並迅速掌控其西部重要城市要道。此舉招致歐盟對莫斯科的譴責，並要求俄國立即自喬治亞境內撤軍。莫斯科警告若歐盟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俄國誓言進行報復。^①8 月 31 日俄國國營電視台播出一段饒人省思的影片：總理 Putin 參觀俄羅斯科學院的烏蘇里 (Ussuriyskiy) 自然保護區時因一頭西伯利亞虎脫逃，Putin 瞬間拿起身旁麻醉槍擊中並制伏老虎。^②俄羅斯對於此一事件的報導方式值

註① 請參考：Paul Reynolds, "Test for a New 'Cold War' in Crimea," *BBC News*, August 27, 2008,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7583810.stm>. (2008. 8.27) .

註② 請參考：BBC, "Putin Shoots Siberian Tiger," <http://news.bbc.co.uk/2/hi/7591456.stm>. (2008.9.1) .

得關注，亦即是否這影片傳達出俄國之外交意圖：若美國與歐盟欲藉喬治亞戰事為由反制俄國，則莫斯科將不惜一戰？抑或這是 Putin 希冀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如此解讀這一新聞片段？

Steingart 在德國明鏡週刊撰文將喬治亞危機與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兩者連結，認為「Putin 是俄羅斯的 Kennedy；而 Putin 的古巴就稱之為喬治亞。」^③儘管 Putin 與 Kennedy 領導風格迥然不同，但 Steingart 的類比正足以說明古巴飛彈危機發生迄今，仍是國際關係領域中的一件重要且經典的個案。事實上，無論是 Putin 射擊老虎之新聞影像、抑或 Khrushchev 於古巴建置飛彈的行為，均涉及關於「信息」(signal)、「意圖」(intention)及「動機」(motive)等「外交信息傳遞」(diplomatic signaling)。

國際關係理論中論述危機管理時，某種程度上亦涉及信息傳遞之觀點。Snyder 與 Diesing 指出，危機協商過程裡雙方透過強制外交之策略向對手傳達「語言」(verbal)或「非語言」(nonverbal)之行動，以便展示其威脅的意圖。^④然而，Snyder 與 Diesing 主要乃是將研究焦點置放在如何使敵人感受其強制外交的威嚇壓力，而非著墨於外交信息自身之內涵與意義。這在其批評 Schelling 所主張非理性策略是強化信息自身可信度之見解時可見一般。^⑤事實上，在國際衝突暨合作領域中，近年來少數學者企圖在危機管理之範疇中，針對外交信息之意涵與其意圖之結果做出貢獻。^⑥這樣的趨勢意味著學界重新反思外交溝通過程中，不該輕忽信息傳遞概念在危機過程中之重要地位。因此關於信息之本質、形態、其可能之意圖、甚至其可欲之結果，都成為研究者思考之方向。

Huth 與 Russett 以及 Fearon 論及恫嚇理論，或指涉權力與利益之平衡觀念時，對外交信息傳遞之議題作出深刻的看法。^⑦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均指涉威脅之「可信度」(credibility)在維護國家「聲譽」(reputation)上的顯著地位。當 Fearon 論及國家領導人可能傳遞不同類型之昂貴成本信息 (costly signals) 以便取信對手關乎己身之外交政策利益時，他點出了信息可能融合具侵略與合作等不同意圖之外交信息。^⑧更有學者主張信息傳遞之焦點為：如何透過敵人過往承諾是否實踐之經驗事實，作為判讀當前

註③ 其原文如下：“In truth, Putin is a Russian Kennedy. And Putin’s Cuba is called Georgia.”請參考：Gabor Steingart, “Learning from Kennedy,” *Spiegel Online*,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572973,00.html>. (2008.8.19).

註④ 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s. 2 and 3.

註⑤ *Ibid.*, p. 222.

註⑥ Richard M. Piou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Limits of Crisis Man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1 (Spring, 2001), pp. 81–105.

註⑦ 請參考：Paul Huth and Bruce Russett, “Testing Deterrence Theory: Rigor Makes a Difference,” *World Politics*, Vol. 42 (1990), pp. 466–501; and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1997), pp. 68–90.

註⑧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p. 69–72.

信息「可信度」之依據。基本上 Smith 與 Fearon 均觸及此類論述。^⑨從信息之角度而言，上述學者將國家「聲譽」再次連結至承諾是否能實踐的研究軌道上。

Press 則在 2005 年所出版的算計可信度：領導人如何評估軍事威脅（*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一書中，針對「歷史行動理論」（past actions theory）提出批判。文中他同意 Mercer 在聲譽與國際政治（*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書中之主張：退縮不見得會減損一國的可信度。^⑩但亦批評 Mercer 所提出之情境解釋，無法說明其自身之見解。弔詭的是，Press 卻建構在 Mercer 的理論架構上，提出所謂「當前算計理論」（current calculus），以便檢驗危機中之雙方如何評估對手之決心與實力。

上述學者其實仍築基於 Schelling 所提出的信息概念之脈絡下，重新賦予外交信息在危機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並且對「可信度」之理論意涵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特別是 Fearon 主張危機中之外交信息，常以威脅暨合作等不同面向交互使用，以便混淆敵人關於己方之真正意圖與決心。^⑪然而，之後學者植基於 Fearon 在 1997 年論述混合訊息之文章，而發展出與「可信度」相關之不同論述，卻反凸顯學者長久以來對「可信度」此一概念，與信息「侵略性」（aggressiveness）彼此關聯的困惑；同時也將其與信息「真實性」（truthfulness）之概念混淆。^⑫這正是本文嘗試以信息的「真實性」與「侵略性」二個向度探究古巴危機其外交信息的重要原因。

Allison 論述古巴危機時，提出「集體過程」（group process）的概念用以指涉「小組團體」（small group）對於政策制定的影響。^⑬這一概念亦涉及「菁英型智庫」（elite think tank）在決策過程中所可能出現「集體迷思」（groupthink）的現象。^⑭很大程度上，此一現象呈現出「認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s）可能性，也指涉因為「錯誤知覺」（misperception），而導致處於危機中的雙方無法確定對手行動的意圖。^⑮此一不

註⑨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3 (1998), pp. 623-638; and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p. 68-90.

註⑩ Daryl G.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 1; and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6-60.

註⑪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p. 68-90.

註⑫ 譬如：Anne E. Sartori, *Deterrence by Diplo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 1.

註⑬ 請參考：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99), pp. 263-294.

註⑭ 關於智庫研究，請參考：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s. 1, and 2; 論及「集體迷思」論述之看法，請參考：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pp. 7-9.

註⑮ 請參考：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uildford, Surr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8.

確定性成為恫嚇理論學者論述古巴飛彈危機時，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基礎：透過使對手感受立即而明顯的脅迫恐懼，以阻止其意圖從事危及己方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潛在性行動。弔詭的是，恫嚇策略中的恐懼性質有時卻導致與原本希冀避戰的相反結果。^⑩

相較於此，國內學者整合關於危機論述之看法，指出透過延展決策過程，以避免過於快速之回應而造成對手因為擔憂可能之攻擊，而展開升高危機的挑釁策略。^⑪這意涵透過延長決策時間，可使對手重新思考軍事衝突或可能導致其不預期之後果。然而，此一論述似乎暗示冒著可能被識破求和意圖之風險，而升高對手在危機談判過程中予取予求的可能性。

學界關於古巴危機的高度興趣，在於提出不同的研究面向藉以分析理解：為何 Kennedy 與 Khrushchev 使彼此陷入一場幾近核戰邊緣的衝突，最終卻又能以相互妥協收場？而華府或莫斯科新近解密與釋出的史料，似乎顛覆以往世人關於美國總統 Kennedy 面對古巴危機時所展現英明睿智的形象，間接佐證了關於 Kennedy 懦弱治理性格之推論。^⑫透過這些新出爐的史料紀錄，致使學界得以重新審視此一瀕臨核戰邊緣的風雲歲月。

承上所述，本文以新近白宮與莫斯科解密之史料為主要參考來源，透過外交信息傳遞的理論觀點，旨在達成三個研究目的：（一）探究古巴危機過程中，Kennedy 與其智囊就恫嚇（deterrence）與妥協兩種不同決策產生的機制。並說明在何種情境下，前者會推翻諮詢小組軍事攻擊古巴的主張；（二）解釋「語言」與「非語言」信息在外交管道的運用。並解析信息之「真實性」與「侵略性」兩面向，在語言與行動各別與交互影響下之可能意圖。（三）透過國際情境、決策菁英及信息傳遞三個層級分析，探究

註⑩ 請參考：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 9;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50~55.

註⑪ 請參考：林正義，「從危機處理分析布希總統的波斯灣戰爭決策」，歐美研究，第22卷第3期（1992年9月），頁23~65；與「論危機處理原則：以中、美經驗為例」，中山學術論叢，第12期（1994年6月），頁143~167。此外，指涉危機之相關論述，請參考，裘兆琳（編），美國外交與危機處理（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3年）。

註⑫ 國際關係學者透過史實資料重新建構之歷史個案分析，並結合不同理論途徑以詮釋歷史個案的作法，某種程度上挑戰了以量性模式分析作為發展危機與衝突事件之通則性研究。2009年5月20日 Ferguson 這位英國歷史學家、同時於哈佛大學教授歷史經濟學，針對金融風暴之看法與獲得諾貝爾獎經濟學家 Krugman，產生意見上之分歧與爭辯。事後 Ferguson 撰文談到 Krugman 這位經濟學家其態度高傲（*De haut en bas*）的經濟見解時，幽默但堅定的使用英諺「貓也可以看看國王」，暗喻經濟學家其所宣稱硬科學的理論典範，似乎並未能預見金融危機的到來；同時反證即使運用歷史研究，其質性研究之結果雖不具備預測之效力，但卻說明歷史分析之重要性在於使後人鑒往知來。其原文為：「Yet a cat may look at a King, and sometimes a historian can challenge an economist.」請參考：Niall Ferguson, "History Lesson for Economists in Thrall to Keynes,"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cms/s/0/a635d12c-4c7c-11de-a6c5-00144feabdc0.html#axzz19lqHYj5v>. (2009.5.29)

及解釋 Kennedy 之恫嚇策略與之後妥協政策背後之決策動機。¹⁹ 本文以為上述國際情境、菁英決策及信息傳遞等三大面向，呼應 Allison 論述古巴危機時所提出，小組團體在決策過程中易出現「集體迷思」之現象。而此一現象將制約菁英如何解釋與理解危機中之國際情境，同時也影響其訊息傳遞的決策行為。

本文其餘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分析關於古巴危機的相關論述；第三節闡述外交信息溝通中「語言」與「非語言」信息的意義，並點出「信息」、「意圖」及「動機」三者和信息傳遞中彼此之意義；第四節指出新史料對於古巴危機詮釋的重要意義，透過新近解密的白宮與莫斯科史料，依據信息傳遞面向重新解釋古巴飛彈危機；第五節則提出關於信息傳遞之詮釋暨分析，並指出對國際衝突領域的理論意涵；第六節則指出外交信息傳遞過程對面臨危機時之決策菁英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貳、關於古巴危機的相關論述

即便時至今日，1962 年發生的古巴飛彈危機仍對國際危機的衝突與解決等領域之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其中 Allison 在 1971 年出版的決策的本質：解釋古巴飛彈危機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一書，當屬最經典的個案分析。²⁰ Allison 提及古巴危機中團體過程 (Group process) 之概念，指涉外交政策中諮詢系統的小組團體 (small group)。此一小組團體因為涉及信息處理的機制，而被視為是智庫 (think tank) 的雛形。²¹ 然而，菁英型智庫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可能將複雜信息扭曲，以符合其過往圖像經驗的過程，²² 成為 Janis 與 Mann 發展「決策衝突模式」(conflict model of Decision-Making) 的重要概念。²³

註¹⁹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鄭偉於 2009 年出版之書中，以信息溝通做為分析古巴危機溝通過程之分析面向。請參考：鄭偉，*國際危機管理與信息溝通*（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頁 24-49、98-107、205-208。然而，本文所提出國際中影響決策者的兩個關鍵情境面向、並連結關乎何種信息特質的決策結果及其可能有的信息結果，均非鄭文中所曾提及，抑或未曾深刻理解之重要理論向度。

註²⁰ 此書於 1993 年修正後再版。Allison 自陳重新出版此書的首要理由，在於有關古巴危機此一事件的新史料出爐，使得原版的解釋或稍顯不夠周延。請參考：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p. vii-viii.

註²¹ 請參考：Richard L. Moreland and John M. Levine, "The Composition of Small Groups," in E. Lawler, B. Murkovsky, C. Ridgeway, and H. Walker (ed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9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003), pp. 237-280.

註²² 請參考：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8.

註²³ 請參考：Irving L. 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Ch. 3.

Vogler 則在這個論述基礎上，強調面臨高度決策壓力時，菁英將會出現「防禦性逃避」(defensive avoidance) 的決策行為。²⁴亦即菁英團體中的成員傾向於詮釋、甚或合理化與其過往經驗意象相互抵觸的信息意圖。Janis 以 1961 年的豬灣事件為分析案例，說明集體思維易出現所謂的「防禦性逃避」的決策行為類型。²⁵而 Schlesinger 以此為分析點，重新解釋 Kennedy 在古巴飛彈危機中，與「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互動之情況，²⁶並主張 Kennedy 不再仰賴軍事顧問的意見，而是透過不同背景的成員以掌握危機中的資訊。²⁷

Schlesinger 的論點呼應了 Janis 針對古巴危機事件中的看法：豬灣事件的失敗，使 Kennedy 理解多元討論形成決策共識的重要性。²⁸然而，Lebow 與 Stein 則主張 Kennedy 政府在古巴危機初期對「執委會」的限制，可能造成對蘇聯行動誤判的危險。²⁹在這個基礎上，McCauley 批判 Janis 關於古巴危機中並未出現「集體迷思」的主張，認為此一論述無法呈現歷史的真實原貌。³⁰McCauley 認為「執委會」在危機初期，強烈要求以軍事手段回應蘇聯部署飛彈的舉措，正是「集體迷思」的體現。儘管如此，George 主張上述學者忽略古巴危機中的決策情境，主張應由「情境多樣性」(contextual diversity) 之角度重新檢視 Kennedy 危機的決策表現。³¹

無論是涉及小組團體、甚或智庫成員對決策的意見提供，上述學者共同指涉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可能因為「集體迷思」現象的產生，而誤判接收之訊息。³²這導致學界嘗試從不同的理論層面，重新解析古巴飛彈危機中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機制。George 從「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 的觀點論述 Kennedy 採用武力恫嚇蘇聯退讓的方式，反映出透過「試探」途徑 (try-and-see approach) 的軍事威脅以便逐步增加敵人的

註²⁴ 請參考：John Vogler, "Perspectives on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 Michael Clarke and Brian White (eds.), *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y: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s Approach*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89), p. 142.

註²⁵ 請參考：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p. 19~30.

註²⁶ 以下簡稱「執委會」。

註²⁷ 請參考：Arthur M.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 296.

註²⁸ 請參考：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p. 134~137.

註²⁹ 請參考：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5.

註³⁰ 請參考：Clark McCauley, "The Nature of Social Influence in Groupthink: Compliance and Interna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7, No. 2 (1989), p. 255.

註³¹ 請參考：Alexander L. George, "From Groupthink to Contextual Analysis of Policy-making Groups," in Paul't Har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eds.), *Beyond Groupthink: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47~50.

註³² 關於小組團體或智庫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 (influence)，請參考：Diane Stone, "Introduction: Thank Tanks, Policy Advice and Governance," in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 1.

決策壓力。³³相較於此，恫嚇理論學者分析美蘇雙方於冷戰期間的論述，則以 Schelling 所提出的「突襲的相互恐懼」(the 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 此概念最為經典。³⁴此概念解釋美蘇於冷戰時期數度對峙，卻未造成戰爭之原因，並說明衝突在危機中被消弭的可能性。正是在這個論述上，Lebow 與 Stein 批判恫嚇理論雖然可能約束對手侵略之行爲，但也恐因此挑起對手的恐懼與危機意識，而採取激進的回應行爲，甚而發動戰爭。³⁵

針對 Lebow 主張恫嚇理論將成爲一種自我挫敗 (self-defeating) 策略的批判，學者諸如 Orme 則主張恫嚇之所以失敗並非對手「非理性」行爲所造成，而是無法及時展現對欲達成目標的清楚承諾 (commitment)。³⁶很大程度上，Lebow 與 Stein 關於恫嚇理論最終因畏戰反而先行攻擊對手而導致恫嚇失敗的觀點，暗示決策菁英因爲偏見，而無法清楚評斷對手軍事能力與抵禦的決心。上述不同理論涉及戰爭與危機之成因時論述各異，並對是否可避免衝突有著不同見解。但無論是 Schelling 提出的「突襲的相互恐懼」；George 論及的「強制外交」；Lebow 述及恐懼有可能成爲戰爭的因素；以及 Orme 關於信息「承諾」的時間選擇，均涉及外交信息傳遞此一重要卻未被相對重視的議題。

參、外交信息傳遞的意義與本質

外交信息傳遞之概念指涉在危機過程中，雙方將其意欲的信息傳達給對方，並從而探究對手可能的回應行動與真實意圖。這指涉三個面向：信息、意圖以及動機。³⁷其中，信息與意圖之差異不但涉及危機中的參與者、信息的本質及溝通之管道外，更意味著或許因「錯誤認知」而導致誤判對手釋出訊息之意義，因而錯估其真實之意圖。此外，動機指涉於何種情境下，領導菁英決定信息釋放之策略、或影響其解讀對手信息背後所隱藏的意圖。這透露出該如何推論敵人決策的概念性論述。正是在這個論證軌跡上，呈現出「語言」信息與「非語言」信息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地位。這些議題建構在這麼一個假設下：國際危機中相互對抗的國家，其外交決策賦予了關於其目的與因應對手行動之可能信息。

註³³ 請參考：Alexander L. George, "Coercive Diplomacy," in 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N. Waltz (eds.),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p. 70~76.

註³⁴ 請參考：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h. 9.

註³⁵ 請參考：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Deterrence and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0, No. 2 (1995), pp. 157~181.

註³⁶ 請參考：John Orme, "Deterrence Failures: 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 No. 4 (1987), pp. 97~124.

註³⁷ 相關論述請參考：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 8.

一、外交信息的意義

外交信息傳遞所呈現之理論意涵在於，企圖影響對方的政策走向或形塑對手採取特定的行動抑或不作為。³⁸當然，此類信息策略背後的期待，乃希冀對方按信息傳遞者的意圖而詮釋，並作出符合信息釋出者其信息設計的行動。然而，此一解析隱含信息溝通中或因「錯誤認知」，而造成與外交信息之意圖大相逕庭的結果。不過，從另一角度而言，國家有時傾向故意傳達錯誤的訊息給敵方以便建立令對手畏懼的形象，或做出錯誤的決策。

決策者嘗試與他國做外交的信息溝通，其目的在於避免使彼此的衝突成為不可收拾的困境。決策者盡力避免傳達「非意圖」(unintended)的信息給對手，以免導致後者因誤解而對情勢產生錯誤的判斷與詮釋。³⁹當然這指涉關於對手其決策背景，與決策模式的理解。即便如此，不確定對方信息意圖的危機感仍普遍存在。特別是具有敵意的雙方，可能並不因傳達出欲緩和衝突的外交信息，而減緩對手可能違背信息內容的危機意識。

學者們就古巴飛彈危機所做出的各種分析及詮釋，涉及國家對意義與符號的操弄。但是過於執著對危機或戰爭成因的探究，反倒忽略對此一外交信息操弄的重要現象。此外，對於恫嚇理論成敗的爭辯：⁴⁰關於理性缺乏 (the lapse of rationality) 的論證：⁴¹抑或論述「決心」(resolution) 議題時，都不經意地指涉「語言」與「非語言」信息在危機發生時的重要地位。⁴²事實上，Schelling 早在 1960 年出版衝突的策略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一書論及「相互認知」(mutual perception) 概念時，就提出行為 (moves) 對語言 (talk) 的重要性。⁴³儘管 Schelling 未針對此一議題深入發展，但其論述卻說明了「非語言」信息在外交溝通中的顯著地位。

Cohen 其權力之舞台：外交信息傳遞的藝術 (Theatre of Power: The Art of Diplomatic Signaling) 一書，為學界首度針對外交折衝中的「非語言」信息做出解析。⁴⁴ Jervis 在國際關係中之意象邏輯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書中，亦曾探討如何於危機中將外交信息傳遞給對手。⁴⁵ Jervis 主張儘管「語言」信息企圖形

註³⁸ 請參考：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The Art of Diplomatic Signaling*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Ch. 1.

註³⁹ *Ibid.*

註⁴⁰ 請參考：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Deterrence and Cold War," pp. 157-181.

註⁴¹ 請參考：John Orme, "Deterrence Failures: A Second Look," pp. 97-100.

註⁴² 請參考：Marian Chapman Moore, "Signals and Choices in a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The Role of Moves and Messages," *Management Sciences*, Vol. 38, No. 4 (1992), pp. 483-500.

註⁴³ 請參考：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 117.

註⁴⁴ 請參考：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Chs. 1 and 2.

註⁴⁵ 此處 Robert Jervis 修正 Festinger 其「認知失調」(cognition dissonance) 理論，以闡述決策領導人容易受到「認知偏見」(cognitive predispositions) 或「錯誤認知」(misperception) 的影響，以解釋其所處的國際環境。請參考：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 1.

塑造對手對己方之意象，但由於偏見反而易使誤會形成。此論述暗示決策者在危機過程中，易向團體壓力傾斜，亦指涉小團體菁英在決策中可能出現的「集體迷思」現象。很大程度上，Jervis 探究的是外交語言（words）信息對國際危機的影響，但同時亦涉及行動（action）在溝通中的重要地位，並指出秘密交往渠道（back channel），對於國與國之間實質議題之達成有一定程度之影響。⁴⁶

上述學者均提出在危機中，國家領導人交互使用「語言」與「非語言」的信息，以便達成其原先預期的政治目標。而「非語言」信息尚能補足，或強化外交語言上無法傳達的意圖。很大程度上，「非語言」信息經常指涉武力的展示（demonstrative use of force）。⁴⁷此種「非語言」信息的主要意圖在於向對方強調「語言」信息上的強度，也因此強化外交信息的「真實性」。⁴⁸這其實隱含一個議題：軍事力量的部署與呈現，屬於隱性溝通的策略模式，某種程度上，或不若「語言」信息來得清晰。這意味武力展示的「非語言」信息有時會造成對方的誤解。當然，若此誤解正是信息傳遞國的意圖，則此一信息將可達成所意欲之目標；反之則將提高彼此衝突，甚至戰爭的風險。⁴⁹相較於此，Jervis 主張所謂明顯的外交信息就是國家對其信息的意圖作清楚與直接的陳述，以避免信息因模糊而有所誤解，⁵⁰這一論述重申了「語言」信息在外交信息溝通中的重要性。儘管如此，語言信息卻常易招致空口白話（cheap talk）的批判。

外交信息溝通中關於「非語言」與「語言」信息是否明確的爭辯，其實指出欲傳達信息之意圖給他國的困難度，與解讀對方信息意義時的挑戰。值得說明的是，儘管「非語言」信息並不總是能在危機過程中，正確傳達其外交意圖，甚至有可能被誤以為是虛張聲勢的策略（bluff）。但在某些狀況下，仍能展現其捍衛國家安全暨利益的承諾與決心。自此一面向觀之，如何拿捏「語言」與「非語言」二者信息的交互運用以便達成外交之目標與意圖，對於身處危機事件中的國家而言，是一項艱困卻重要的工作。

二、外交信息的本質

由外交信息傳遞之觀點切入，分析古巴危機時，下述二個信息面向展現一定程度

註⁴⁶ Ibid., p. 238; and 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pp. 152–156.

註⁴⁷ 請參考：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Ch. 1.

註⁴⁸ 請參考：Oliver P. Hair and Thomas S. Robertson, "Toward a Theory of Competitive Market Signaling: A Research Agend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2, No. 6 (1991), pp. 403–418.

註⁴⁹ 此處之前提必須在於危機中的雙方均以避戰為前提。

註⁵⁰ 請參考：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1.

之重要性：「真實性」與「侵略性」。^{⑤①}然而論及這兩種信息特質前，有必要說明既存文獻連結恫嚇威脅，與「可信度」等概念時所出現的理論缺口，以呈現本文提出理論修正之正當性。

整體而言，學界分析恫嚇理論與「可信度」時，並未能清楚界定出以下一個理解面向：「可信度」指涉二個層面，一是信息接收方探究敵人信息之特質；一是信息自身之特性（characteristics）。首先，學者涉及衡量對手之「可信度」時，常與其國家聲望、或其承諾是否實踐之過往歷史連結。這其實點出了「可信度」乃是危機中對於敵對方特質的評價。易言之，無論是 Huth, Fearon, Mercer 或 Press 之著作，儘管都暗示卻未釐清「可信度」須由信息接收之一方來探究。^{⑤②}亦即關於信息接收方對敵人信息之特質，與意義的詮釋，方是對所謂「可信度」概念的正确理解。第二、即使論及信息自身之「可信度」時，仍須從接收者的角度來分析。某種程度上，倘若談論的是「可信度」之特質時，則無可避免須論及信息強度（strength）此一概念。^{⑤③}

然而，Fearon 將其所提出之具威脅與合作的混合信息策略與信息「可信度」作出關聯時，並未持續探究「可信度」應如前所述分為二個分析層面。這使得後續學者運用其所提出之昂貴成本信息以分析國際危機衝突時，似乎忽略其混合策略論述中關乎與信息「可信度」之隱晦連結。^{⑤④}首先、本文以為 Fearon 所提及混合外交信息中的威脅與合作成分，其實指涉的應是信息之威脅程度或範圍，而非信息的「可信度」。其次，此一混合策略若是以部分真實、部分虛假二個不同信息面向觀之，則其凸顯的正是本文主張的信息「真實性」之議題。這樣的邏輯論述某種程度上，暗示了學者企圖談論真偽夾雜的混合信息時，忽略信息「真實性」、才是分析此類混合信息之重要分析概念。

又論及「侵略性」概念時，儘管學界論述所在多有，然而大部分之觀點乃是指涉威脅的侵略性意涵。儘管點出了由威脅方所釋出威脅之行動、或語言涉及了外交信息

註⑤① 鄭偉於 2009 年之書中，或許混淆 information 與 signal 彼此不同定義之差異，誤將前者作為分析信息傳遞之行動者其主觀行為的單位。同時，似乎亦未理解信息「明確性」不該與信息的欺瞞性質（deception）相對應；亦不該將「威懾之可信度」（本書以恫嚇一詞代替威懾）兩個全然不同的構念結合（威懾與可信度）作為分析美蘇雙方在古巴危機中雙向之恫嚇過程，卻未察覺相連兩者其理論意涵上出現之謬誤。請參考：鄭偉，*國際危機管理與信息溝通*，頁 24-49、98-107、205-208。學者引介國外文獻對於「戰略明確」看法時，似乎亦跳躍式地連結「可信度」此概念。見林正義，「『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美國預防台海危機的政策辯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21。

註⑤②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6-60; Paul Huth and Bruce Russett, "Testing Deterrence Theory," pp. 466-501; and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p. 68-90; and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Ch. 1.

註⑤③ 當然，「可信度」此一概念尚涉及其他重要分析面向，只是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註⑤④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p. 69-72. 又 Huth 在 1988 年提及恫嚇理論與「可信度」之關聯時，隱喻了若欲分析信息之「可信度」，無可避免須透過信息接收之一方來進行分析。請參考：Paul Huth,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1.

傳遞的概念，卻未對信息自身特質作出說明。這是為何大部分學者提到威脅之概念時，談論的其實是威脅之價值或認知。^⑤易言之，上述學者乃是將此一概念與威脅價值連結，以便分析國家發動戰爭、或升高危機與否時的重要機制。這與本文企圖通過信息之本質來探究侵略性之概念有著根本上之不同。

此外學界針對信息「侵略性」意涵之論述不在少數，論者針對信息「侵略性」之看法亦不盡相同。總括而言，若從外交信息之角度觀之，則此類文獻大多涉及國家「聲譽」、恫嚇理論、甚至理性與否等概念。譬如 Sartori 指出為了確保己方在未來危機中保有恫嚇之聲譽，國家領導人通常會傳遞誠實（honesty）的信息給對手。^⑥

因此，本文關乎信息的「真實性」與「侵略性」之見解如下：第一，信息的「真實性」指指向他國傳達自身確切的意圖、動機、目標，或反映出真實的情況。信息釋放者透露真實的外交意圖，以便使對手有較多的情報資訊以決定相對應的行動。這樣的作法能避免於外交溝通上，因誤判所引起不必要之衝突。^⑦然而，危機過程中即使國家傳達出真實之信息，並不能就此以為此信息能被對方正確詮釋。此外信息「真實性」之概念尚隱含著「虛張聲勢」的信息意涵在內。^⑧亦即若不同信息在內容上相互矛盾，則此類外交信息可能為有意設計誘導敵人，使之誤判信息傳遞者的意圖或整體局勢。其目的在於使敵人因錯誤的推論，而採取符合信息傳遞國利益的行動。

第二，信息的「侵略性」則涉及傳遞具敵意威脅意圖的外交信息。^⑨國家透過具敵意或攻擊性的信息策略，以達成所欲求的目標。事實上，具侵略性的信息與前述所提及之恫嚇理論或強制外交等策略意涵頗為近似。即國家意圖使用此等信息，迫使其對手在相互衝突的利益議題上作出讓步。然而，具敵意的外交信息所隱含的論述在於：可能需面對此敵意信息所導致的非預期性結果。^⑩換言之，此類型信息可能導致對方採取相對激烈的報復策略，從而導致戰爭爆發的可能性。^⑪

註⑤ 相關論述，請參考：Michael Brecher, *Crises in World Politics: Theory and Reality* (New York: PERGAMON, 1993), Chs. 1, 3, and 4; and Alexandra Guisinger and Alastair Smith, "Honest Threats: The Interaction of Reput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2 (2002), pp. 175-200.

註⑥ 此處 Sartori 以 1950 年韓戰說明「誠實」信息對外交媾和影響之個案見解不無疑義，只是這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Anne E. Sartori, *Deterrence by Diplomacy*, Ch. 2.

註⑦ 請參考：Oliver P. Hair and Thomas S. Robertson, "Toward a Theory of Competitive Market Signaling: A Research Agenda," pp. 403-415; Jaideep Prabhu and David W. Stewart, "Signaling Strategies in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Building Reputations and Hiding the Truth,"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 38, No. 1 (2001), pp. 62-72.

註⑧ 請參考：Jaideep Prabhu and David W. Stewart, "Signaling Strategies in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Building Reputations and Hiding the Truth," pp. 65-66.

註⑨ 請參考：Alexandra Guisinger and Alastair Smith, "Honest Threats," pp. 175-200.

註⑩ 請參考：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Deterrence and Cold War," pp. 157-181.

註⑪ 限於篇幅，本文並未針對此信息之兩個面向間之影響做出說明，但所提出兩個信息特質分析向度，可結構出不同決策類型下可能的結果矩陣。其相關分析策略，請參考：賈明成、陳建維，「紮根理論與質性研究：調和觀點」，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28。

肆、外交信息之決策情境

透過外交信息的分析觀點探究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時，尚涉及外交信息背後國家之意圖與決策的動機。本文以為 Cohen 論述外交信息時，過於著重信息的類型分析。^②因此，吾人將國家信息策略形成之軌跡，置放於古巴危機個案的重新詮釋暨分析所結論出的理解中：國際情境如何驅動決策菁英決定其外交信息的意圖與解讀對手的信息。本文以為決策菁英此一範疇指涉總統與其決策智囊彼此之互動形式。這一互動模式隱含以下論述：是否可能導致「集體迷思」的決策氛圍、抑或總統的決策意見可能撼動此「集體迷思」之現象？此外，決策菁英透過情報系統所提供關於對手行動信息的情資，做為評估與判斷國際情境是否急迫之重要參考依據。

本文提出危機之急切與否，指涉情境中關於「威脅的認知」與「受辱的恐懼」兩個分析面向。首先，「威脅的認知」涉及在危機中，被威脅的一方認為對手信息之敵意具有攻擊能力時，則前者將動員國家資源以捍衛國家之利益或承諾。^③事實上，這指涉一個重要情境：若國家領導人不確定對手的意圖時，國家將感受到被威脅的逼迫感。其次，「受辱的恐懼」意謂國家領導人擔憂面臨過往相似受辱的經驗。George 主張決策者能透過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的角度認知國際危機的情境圖像。^④亦即領導人對國際情境之認知，影響危機中的雙方如何看待彼此，並因而形塑各自決策。

透過上述二個概念的交互影響，決策菁英對目前具爭議之國際情勢作出判斷，以便決定是否該作出攻擊、挑戰現狀，抑或退讓的決策。在危機過程裡的對位關係中，上述兩個情境面向的互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的外交信息傳遞行為。當然，這涉及信息傳遞之系統，包括軍方、外交體系及非正式管道傳遞外交信息。事實上，透過對古巴危機的重新理解，本文以為國際危機情境，將制約甚或形塑領導菁英關於對手的認知意象，亦影響自身解讀對手其「語言」或「非語言」信息的某種特定期待。

同時這意味由於存在無法掌握對方未來可能採取何種策略的不確定性，故決策菁英企圖以信息傳遞的方式試探對方可能的外交回應。這涉及如何將所欲的信息意圖利用編碼，包括信息的「真實性」與「侵略性」傳達給對手。透過理解上述三個面向：決策菁英、國際情境及信息傳遞之系統的研究途徑，除了反映 Hart、Stern 及 Sundelius

註② 請參考：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Ch. 1.

註③ 請參考：Nehamia Friedland and Ariel Merari,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errorism: A Double-Edged Swor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6, No. 4 (1985), pp. 591-604; Alexandra Guisinger and Alastair Smith, "Honest Threats: The Interaction of Reput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p. 175-200.

註④ 請參考：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Chs. 2 and 3.

論述「小團體決策」時，曾隱晦表示在國際系統中危機情境對決策的重要性外，^⑥也暗示決策者認知意象上可能扭曲對信息之解讀與詮釋。

伍、重新審視古巴飛彈危機

1962 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堪稱國際衝突研究領域中的經典個案。特別是相關史料不斷被解密或釋出，使得學界可重新審視這幾近戰爭邊緣的歲月風雲。^⑦透過對上述史料的分析，本文希冀從外交信息傳遞的三個面向，重新詮釋冷戰期間令人屏息以對的古巴飛彈危機。

一、飛彈部署：「非語言」的威脅信息

（一）國際情境面向

1962 年 10 月 16 日，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 Bundy 告知 Kennedy 總統，中情局透過 U-2 偵照機判斷，蘇聯已在古巴設置具攻擊性的「中程彈道飛彈」(Medium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且其射程涵蓋華府。Kennedy 即刻成立「執委會」分析研判對策。^⑧從「威脅認知」的角度觀之，蘇聯的軍事行動對美方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但由於無法確知蘇聯此舉之意圖，Kennedy 會晤蘇聯外長 Gromyko 以便了解 Khrushchev 的政治盤算。然而 Gromyko 數度以美軍 1961 年豬灣事件之冒進失敗調侃 Kennedy，使其感受被 Khrushchev 所輕視。^⑨

註⑥ 請參考：Paul't Har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Foreign Policy-making at the Top: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in Paul't Har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eds.), *Beyond Groupthink: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12–13.

註⑦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 John F. Kennedy and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Meeting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Inside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本文採用 Stern 一書做為重要資料分析之原因，在於他重新修正 Ernest R. May 與 Philip D. Zelikow 兩位作者對於白宮錄音帶譯文的諸多疏漏。請參考：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Sheldon M. Stern, "Source Material: The 1997 Published Transcripts of the JFK Cuban Missile Crisis Tapes: Too Good to Be Tru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 3 (Sep., 2000), pp. 586–593. 此外，Weiner 撰寫的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與 Fursenko 與 Nattali 依據蘇聯政治局、情報系統的解密檔案，分別出版之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與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等史料書籍，均是相關重要資料來源。請參考：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and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註⑧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 pp. 57–63.

註⑨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61–63.

(二) 決策菁英面向

在隨後的討論過程中，「執委會」大致出現強硬與溫和兩派論證勢力。^{註69}前者主張以空中突襲（Air Strike）的軍事手段，解決飛彈部署所造成的國家安全問題；後者則希冀避免走上軍事衝突的態勢。^{註70}Kennedy 於危機事件發生初始，認為若對古巴發動攻擊將招致蘇聯入侵柏林。然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Taylor 與 Bundy 指稱 Khrushchev 置放飛彈之企圖絕非防禦性質，強調應以空中突襲之軍事行動強硬回擊。國防部長 McNamara 亦主張必須於對方飛彈可運作前實施空中突襲。國務卿 Rusk 則對軍事行動持保留態度，並以美軍在土耳其之核武基地為例，認為美方對蘇聯所構成的威脅恐懼程度其實大於蘇聯對美方的威脅。^{註71}時任司法部長的 Robert Kennedy 則持強硬態度要求軍事全面入侵以解決此一紛爭。此時，Kennedy 態度亦不認為非武力的選項能迫使 Khrushchev 撤離其在古巴的飛彈部署。^{註72}

(三) 信息傳遞面向

Kennedy 於危機後兩天（10月18日）透過與蘇外長 Gromyko 會晤之機會，向 Khrushchev 傳遞其不會進犯古巴的意圖，並重申美國不會容許蘇聯在古巴設置攻擊性武器。^{註73}然而，由於 Kennedy 並未將美軍偵察之結果告知 Gromyko，主要原因在於欲試探蘇聯置放飛彈於古巴的真實意圖，因此不願公開對質 U-2 偵察機所攝得的情報結果，以免因此而激怒 Khrushchev。根據白宮錄音帶的譯文顯示，Kennedy 沮喪蘇聯外

註69 執委會（ExComm）主要以下述成員為主：副總統（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Lyndon B. Johnson、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Dean Rusk、國務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George W. Ball、負責政治事務之副國務次卿（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U. Alexis Johnson、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Edwin Martin、財政部長（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Douglas Dillon、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Robert F. Kennedy、中情局局長（Directo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ohn McCone、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Affairs）McGeorge Bundy、國防部長（Secretary of Defense）Robert S. McNamara、副國防部長（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Roswell Gilpatric、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Chairman, Joint Chiefs of Staff）Maxwell D. Taylor、國際安全事務之助理國防部長（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Paul H. Nitze、總統特別顧問（Special Counsel to the President）Theodore C. Sorensen、無任所大使（United States Ambassador-at-Large）Llewellyn E. Thompson、空軍參謀長（the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Curtis LeMay、前國務卿（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Dean Acheson、以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Adlai Stevenson。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29–35.

註70 由於無法確定 U-2 偵查照片中的核武是否已準備就緒，「執委會」成員大致上主張以武力卸除蘇聯的威脅，只是其中程度不同。請參考：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Ch. 18.

註71 請參考：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p. 201.

註72 此段詮釋主要來自於 Fursenko、Naftali 與 Tim Weiner 不同作者的資料，其共同指涉 Kennedy 焦急且武斷地要求以突襲方式解除威脅。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p. 225; and 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pp. 200–203.

註73 請參考：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 68.

長 Gromyko 隱瞞飛彈一事。這似乎說明 Kennedy 自上任以來面對 Khrushchev 時，畏懼其可能採取的不理性決策行為所表現出的無力感。^{註 61}

此時期美方不斷透過情資系統確認蘇聯於古巴建構的導彈型號與是否已可運作發射作為決策參考。同時「執委會」中強硬派所主導的空中突襲的態勢越益明顯，使得 Kennedy 初期亦傾向以無預警的空中襲擊解除蘇方對美的威脅。無論如何，在「執委會」會議初始，儘管擔憂蘇聯的武力報復，但以軍事行動迫其撤離古巴飛彈似乎逐漸形成共識。Kennedy 由原本不欲引起戰事的謹慎態度，轉變為希冀以有限度空襲飛彈基地的傾向。

二、海上封鎖策略：試探信息

（一）國際情境面向

20 日由中情局提供關於蘇聯飛彈的運作現狀資料，顯示至少有八枚中程彈道導彈（MRBM）可立即由古巴發射。這意味美軍對古巴的任何軍事行動都有可能引起蘇聯的核武攻擊報復。此一可能性使得 Kennedy 重新思索是否先前空中突襲之計畫將導致 Khrushchev 的報復，故轉而傾向中情局局長 McCone 海上封鎖的建議。^{註 62}

（二）決策菁英面向

儘管 Rusk 主張海上封鎖對蘇聯或許有恫嚇的作用，但 Ball 與 Bundy 質疑不宣戰就逕自封鎖是一種非法行為。^{註 63} 22 日當執委會成員討論擬訂 Kennedy 當晚的演說內容時，軍方主張攻擊的壓力並未曾減緩。^{註 64} 儘管如此，晚間 Kennedy 透過蘇聯大使 Dobrynin 轉交私人信件給 Khrushchev，說明美方對蘇聯在古巴設置飛彈的看法。7 時許演說宣布將於 24 日上午 10 點實施海上封鎖政策，以阻止任何攜帶攻擊性武器運往古巴的船艦。對白宮而言，歷經 7 天的爭辯與討論，途中一度準備以軍事行動攻擊古巴，終於被相對較不激進的海上封鎖政策所取代。

註 61 早在 1962 年 8 月 8 日 Kennedy 與 Thompson 討論 Khrushchev 其人時，便指出因為 Khrushchev 視美國法權，故在柏林議題上展現對美剽悍且嚴厲的立場。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 450.

註 62 關於海上封鎖並輔以軍事威脅的提案者，有不同的說法；Stern 認為海上封鎖此一策略應由國防部長 McNamara 所提出；而 Weiner 卻主張時任中情局局長 John McCone 方是此方案的提案人。本文傾向 Weiner 之看法，主要原因為 McNamara 危機初始即主張武力入侵古巴，而 McCone 則力主以軍事威脅為手段實施海上封鎖。請參考：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pp. 201-203；Sheldon M. Stern,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s"*, p. 94.

註 63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59-60.

註 64 軍方在古巴危機中的強勢看法與對 Kennedy 之不滿，當屬 22 日 Nitze 與 Kennedy 的對話最是經典。這段針鋒相對的談話從 Stern 的資料解密中可窺見一二。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78-80.

(三) 信息傳遞面向

Kennedy 宣布將實施具武力恫嚇性質的「海上封鎖」策略，有兩點值得關注：(1)「預告」(preannouncement)之行動，導致對手感受「攻擊性」信息的恐懼：華盛頓於中午時分宣布，Kennedy 將於 22 日晚間 7 點整發表聲明，期間經歷的 7 個小時加深了 Khrushchev 與政治局成員對美國可能發動戰爭的恐懼。⁷⁸美方其背後的動機，存在著武力恫嚇性質的意圖，但又須刻意隱瞞不欲發動戰爭的目的，以免蘇聯誤判局勢而發動戰爭，或知悉其恫嚇本質而無所畏懼。此一故意使對手等待的「不作為」，⁷⁹的確達成恫嚇威脅使之心生畏懼的目的。

(2) 信息「真實性」之議題：當日下午 6 時，美國國務卿 Rusk 轉交蘇聯大使一封 Kennedy 給 Khrushchev 的私人信函。儘管信件中指出後者應該要正確理解在任何情況下，美國的意願與決心，⁸⁰卻又強調雙方切莫惡化目前緊張對峙的態勢。易言之，此一私函事實上傳達出不希冀危機擴大的信息，相較於 Kennedy 透過正式管道傳達具侵略性意圖的「海上封鎖」政策，所出現的信息差距正反映出 Kennedy 海上封鎖政策的恫嚇本質。

三、互留一手的政治角力：「語言」與「非語言」信息

(一) 國際情境面向

Khrushchev 於 23 日聲明無法認同美國「海上封鎖」的片面決定，也希冀美方「展現審慎並聲明放棄可能對世界和平造成毀滅性結果的行動」。⁸¹從「威脅認知」的角度而言，Kennedy 與「執委會」成員認為 Khrushchev 譴責美國「海上封鎖」為一高度挑釁的信息，並擔憂蘇聯船艦可能強行突破海上隔離線前往古巴。由「恐懼受辱」的面向觀之，Khrushchev 於信中要求美方在「海上封鎖」決策應展現謹慎的外交辭令，似乎心理層面上傳達輕慢之語言信息。

(二) 決策菁英面向

美軍 24 日上午 10 點實施海上封鎖之行動，等於傳達出戰爭的信息。若如是，則

註⁷⁸ 就 Khrushchev 而言，10 月 22 日才是古巴危機的開始。特別是得知 Kennedy 準備作公開聲明時，Khrushchev 與政治局委員強烈感受到具侵略性的「威脅」愈益強勁，也因此認為戰爭的可能性已然升高。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 240.

註⁷⁹ 相關論述，請參考：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 45.

註⁸⁰ 請參考：JFK to NSK, October 22, 196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ume_vi/exchanges.html.

註⁸¹ 其譯文如下：「I hope that Government of United States will show prudence and renounce actions pursued by you, which could lead to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請參考：NSK to JFK, October 23, 196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ume_vi/exchanges.html; and 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 477.

Kennedy「海上封鎖」政策將面臨蘇聯軍艦的直接挑戰。這對於極力避免與蘇聯核武對抗的 Kennedy 而言，陷入兩難的局面：若即刻以武力反擊，則一場原先不欲引發之核武戰爭或將引爆；然若任由蘇聯軍艦通過而不採取攔截行動，則美國非但國際聲望沒有威信，其後採取恫嚇的外交信息策略亦將宣告失敗。然而 24 日海軍情報顯示接近古巴海域封鎖線的蘇聯船艦都已停止繼續航行，^{註 82} Rusk 認為這表示美國在恫嚇的過程中略佔優勢，使得白宮認知威脅的情境似乎稍事停歇。^{註 83} 這一行動使得 Kennedy 主張或許 Khrushchev 亦希冀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此一危機，並逐漸對「執委會」強硬派的軍事攻擊主張產生質疑。

（三）信息傳遞面向

美方 24 日「海上封鎖」政策執行後，屬於「非語言」信息。由信息「侵略性」的角度觀之：因其「行動」展示侵略意圖，故必須具有使對手相信此一威脅乃為真實意圖的表現。很大程度上，「非語言」信息隱含信息的不可逆性質。以此觀之，「海上封鎖」行動不但展現信息中侵略性的強度，呈現 Kennedy 政府捍衛美國聲望的決心；也暗示若對手仍執意硬闖封鎖線，美方被迫必須以武力回應以維護承諾。^{註 84}

此外，Kennedy 25 日的信件中，傳達美國要求蘇方儘速撤離飛彈與堅持海上封鎖行動的決心。透過這封語言信息的傳達，Kennedy 說明美國並非是挑起此次危機之始作俑者，並在結尾時指出「這些事件將導致彼此關係之惡化。」^{註 85} 另一方面，在信件中故意不提蘇聯船艦停航所傳遞不欲危機升高之信息，Kennedy 企圖透過「語言」信息中之「不作爲」行動使對手疑惑，以便試探 Khrushchev 傳遞更為清楚的信息。^{註 86} 由此觀之，Kennedy 交互運用「語言」與「非語言」之兩種信息模式，以便清楚說明其要求蘇聯立即停止任何將造成核戰威脅的決心不容質疑與挑戰。^{註 87}

註 82 請參考：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p. 204.

註 83 Rusk 當時的說法是：「當我們雙方正以眼還眼時，對方顯露膽怯了。」其原文如下：「We are eyeball to eyeball, and I think the other fellow just blinked.」請參考：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p. 204.

註 84 依據蘇聯解密的資料顯示，Khrushchev 並無意透過衝撞美國的海上封鎖線，以測試 Kennedy 的決心。因為除了恐懼有可能使危機升高，亦擔憂船艦所載運的策略性核彈武器落入美方手中。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 477.

註 85 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p. 259.

註 86 當時 Khrushchev 亦考量是否 Kennedy 注意到蘇聯船艦停航的外交意義。並認為美方自 22 日海上封鎖線設立以來仍未動武，這意味 Kennedy 不欲危機惡化。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p. 487-488.

註 87 值得一提的是，當日下午仍有蘇聯船艦航向古巴，其中以 Bucharest 這艘油輪最接近封鎖線，當向美方表明身分後，美軍對其放行。Kennedy 並曾詢問 McNamara 這一放行事件對蘇聯有何影響，這反映 Kennedy 盡力避免危機擴大的企圖。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123-125.

四、秘密協商與 U-2 擊落事件

(一) 國際情境面向

26日晚上9點 Kennedy 收到 Khrushchev 的一封信函，信中重申美軍豬灣事件對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的重大影響外，並希冀若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則蘇聯將自古巴撤出飛彈。⁸⁸ Khrushchev 並稱許 Kennedy 勇於承認豬灣事件為一嚴重錯誤之舉措，暗示彼此應可相互信任、承諾並尋找危機終結的方式。相較之前數封信件，此信函似較不具侵略性意圖。⁸⁹然而，27日華府從莫斯科分社得知 Khrushchev 一改先前立場，透過廣播告知若美國將飛彈撤離土耳其，則蘇方亦將解除古巴飛彈作為交換條件。⁹⁰下午 U-2 擊落事件更是震驚華府。由「威脅認知」的角度觀察，U-2 擊落事件為一「非語言」信息，傳遞出高度敵視的意圖。另就「恐懼受辱」的面向而言，因與 Khrushchev 尋求和平解決危機的兩封信函矛盾從而加深美方恐懼程度。

(二) 決策菁英面向

當 Kennedy 與「執委會」研擬 Khrushchev 兩封彼此信息混淆之信件其真實意圖與因應方案時，當日下午 U-2 擊落事件卻使得 Kennedy 陷入決策風暴中。幾乎大部分「執委會」成員反對 Kennedy 接受 Khrushchev 的第二封透過廣播的提議。包括 Rusk、Bundy 與參謀首長聯席會均質疑 26 與 27 日兩封信件內容的不一致，暗示 Khrushchev 或許被蘇方強硬派所掌控。⁹¹ McNamara 針對美方 U-2 擊落事件作出說明，認為此「非言語」信息傳遞與美方開戰的意圖。其中參謀首長聯席會 Taylor 將軍與 Nitze，要求以空中優勢攻擊古巴的薩姆防空飛彈基地（SAM-Surface to Air Missile）。儘管如此，震驚中的 Kennedy 仍力主慎重並決定擱置報復行動，主張先討論如何回覆這兩封彼此信息矛盾的信函。

(三) 信息傳遞面向

Kennedy 於 27 日晚間透過其弟 Robert Kennedy 與蘇聯大使 Dobrynin 秘密會面，傳達美國接受 Khrushchev 的提議，⁹²並要求蘇方不得將此一私下會談公諸於世。公開信中 Kennedy 刻意忽略撤離土耳其導彈的議題，只針對 Khrushchev 26 日之意見，同意保證不進犯古巴為條件以交換蘇聯自古巴撤離飛彈，這是學者以為 Kennedy 的決策行為反映了睿智與理性思維。從信息傳遞角度觀之，Kennedy 並未在稍晚的信件中提及

註88 請參考：NSK to JFK, October 26, 196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ume_vi/exchanges.html.

註89 此次信件使傾向鷹派路線的 Robert Kennedy，都指陳情勢樂觀許多。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 p. 287.

註90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 p. 291.

註91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174-176.

註92 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 489.

U-2 擊落事件，暗示不希望此事件成為與蘇方達成協議的阻礙。^{註④}此處的不作為傳遞了美方欲達成共識的決心。

五、共識：信息中的故意不作為

（一）國際情境面向

Khrushchev 即刻於 28 日透過廣播聲明接受美方的建議。由於雙方均未提及 U-2 事件，只涉及美國另一架偵察機侵犯蘇聯北部邊界之事。代表美、蘇領導人有意忽略此一突發事件，以便傳達相互理解與諒解的默契。同時 Khrushchev 希冀美方必須謹慎處理，特別是當兩國「正經歷令人焦慮的危機中」。^{註⑤} Khrushchev 在信息中的「不作為」意圖，傳達其對 U-2 被擊事件事前並無所悉，並暗示 Kennedy 切莫採取令雙方遺憾的軍事回擊。儘管 Khrushchev 未提及 U-2 被擊事件，但卻提醒 Kennedy 在 1960 年時的 U-2 擊落事件導致巴黎會談中斷之後果。^{註⑥}此一外交信息，與不待華府取得此 28 日信函即逕自於電台廣播撤退飛彈之舉動，均傳遞希冀在時間的壓力下，結束這場幾近核戰爭邊緣的危機。

（二）決策菁英面向

相較於 U-2 擊落事件所傳遞的高度威脅信息，儘管 Khrushchev 二封信函似乎矛盾，但至少傳達其嘗試解決危機的意圖。Kennedy 認為美國無可迴避地必須處理 Khrushchev 公開信所提出飛彈交換的建議，並認為這是平和方式結束危機的最終手段。^{註⑦}當 Kennedy 10 月 28 日得知 Khrushchev 透過廣播回覆，將撤離布署於古巴之飛彈時，參謀首長聯席會仍對 Khrushchev 的信函抱持高度懷疑，並主張應於 24 小時內對古巴發動空中攻擊，但 Kennedy 最終接受 Khrushchev 的妥協聲明。

（三）信息傳遞面向

Kennedy 回覆 Khrushchev 之信件中說明，儘管尚未收到蘇聯正式文本，依然即刻回覆其所關注的議題。此處 Kennedy 選擇不待 Khrushchev 其正式信函抵達華府而即刻回覆的行為，傳達前者意欲尋求解決危機的急迫性。亦透露出其信息「真實性」的程度升高，同時「威脅性」強度降低。整起自 10 月 16 日起至 28 日止造成兩國多次外交

註④ 請參考：JFK to NSK, October 27, 196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ume_vi/exchanges.html.

註⑤ 此封信函透過莫斯科電台發送，其原文如下：“Therefore, you can imagine the responsibility you are assuming especially now, when we are living through such anxious times.”請參考：NSK to JFK, October 28, 196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ume_vi/exchanges.html.

註⑥ 其原文如下：“I should like to remind you, Mr. President, In 1960 we shot down your U-2 plane, whose reconnaissance flight over the USSR wrecked the summit meeting in Paris.”請參考：NSK to JFK, October 28, 1962,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ume_vi/exchanges.html.

註⑦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184-186.

衝突的古巴危機，因美蘇雙方相互妥協而由戰爭邊緣拉回。

陸、外交信息之解讀與傳遞

透過外交信息傳遞觀點的分析，本研究重新探究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中：美方如何歷經使雙方瀕臨戰爭邊緣的恫嚇政策失敗後，卻又以談判之方式結束這可能導致核戰衝突的危機。事實上，這一提問指涉古巴危機中的重要議題：何時 Kennedy 會採納或拒絕「執委會」的意見而決定關於訊息決策的方向？根據新近解密的史料為本，美國總統 Kennedy 在古巴飛彈危機中的決策機制涉及三個重要面向：（一）國際情境、（二）決策菁英，以及（三）外交信息傳遞。吾人將分別闡述其對於國際衝突理論的意涵。

一、國際情境

國際情境指涉身處危機中之菁英透過情報系統偵查得知之情資，分析並研究對手所釋出的「語言」或「非語言」信息所傳遞的意圖。本文指出影響菁英從事外交信息決策的兩個重要向度：「威脅的認知」與「受辱的恐懼」。前者說明決策菁英對於信息是否具有攻擊性的認知；後者指出欲避免可預期的羞辱所引起的焦慮。首先，就理論意涵而言，「聲望」意味國家如何理解對手「歷史行動」的認知意象，並詮釋對方所釋出的外交信息之意圖。^{註99}它是有關信息接受方如何詮釋對手，是否會實踐其信息中所傳達的威脅承諾之可能性。此一認知意象卻隱含 Jervis 或 George 關於「錯誤認知」概念的看法。^{註100}以此觀之，國家依據對手過往的行為實踐，形塑關於敵人的認知意象，並因影響其可能的回應策略。

譬如，Kennedy 深受 Khrushchev 於 1960 年巴黎峰會時所表現蠻橫態度的影響，故擔憂後者會於古巴飛彈危機中採取激烈與非理性的決策。^{註101}相較於此，Khrushchev 自始即認為 Kennedy 無法掌握「中情局」與軍方的作為，故擔憂危機可能一觸即發。^{註102}弔詭的是，儘管蘇聯在 1961 年的兩次柏林危機，其「歷史行動」並未完全實踐最後通牒中的強硬內容，但 Kennedy 政府並未因蘇聯虛張聲勢的紀錄，而在古巴危機中對其採取強硬姿態。

其次，在國際危機衝突與對抗中，儘管軍事威脅可向對手展現關於爭議中的國家

註99 請參考：Daryl G. Press, "The Credibility of Power: Assessing Threats during the 'Appeasement' Crises of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4/5), pp. 136–169.

註100 請參考：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 Misperception*, Ch. 1; and 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Ch. 2.

註101 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 450.

註102 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 442.

利益的決心與承諾，但亦可能使對手因害怕遭受攻擊而採取激烈的回應手段。¹¹此處隱含一個重要論述，倘若是權力平衡下的美蘇雙方，或許因為畏懼核戰所造成的相互毀滅，可能更謹慎彼此信息傳遞背後的意圖，而以相互妥協方式結束危機。然而，若是在權力不對稱（asymmetrical）的危機衝突中，弱勢一方除了屈從外，或因其外交信息易受輕忽而以激烈報復性手段反擊對手。此種因懼怕先受敵方侵略而發動的先制攻擊，凸顯如何解讀信息意圖的重要性。

二、決策菁英

此一範疇涉及美國總統與「執委會」成員彼此互動的過程，與決策菁英如何判斷對手外交信息的議題。古巴危機此個案反映決策過程中出現「集體迷思」的現象。這回溯到先前所提及之議題：何時 Kennedy 可能受此現象影響、何時會撼動這一壓力作出決策？事實上，儘管 Janis 主張古巴飛彈危機並未出現「集體迷思」的決策模式，¹²但本文根據新近史料的分析，同時建構在 McCauley 修正 Janis 之觀點上，指出「集體迷思」之現象在整個危機過程中似乎一直存在。

事實上，Janis 論及古巴危機時主張 Kennedy 由 1961 年之豬灣戰爭中得到教訓：必須有不同背景，特別是有別於軍方的諮詢管道進入決策圈，以避免處理古巴危機時犯下對情勢過度樂觀的錯誤決策。因此，Janis 提出了古巴危機過程中「執委會」成員彼此激烈的爭論，正說明「集體迷思」並不存在。¹³然而，McCauley 卻提出相反論述，主張 McNamara 與 Bundy 在危機初期第一次會議中，由原先反對強制性回應轉變成擁護空襲之立場，正說明「集體迷思」中所謂內化（internalized）團體規範之影響趨勢。¹⁴這是 McCauley 強調古巴危機前期的確出現「集體迷思」情形之重要見解。

本文進一步建構在 McCauley 修正 Janis 其「集體迷思」之論述上，主張處在高度凝聚性氛圍中的成員，除了有順從團體意見的傾向外，有時亦會挑戰既定的政策方向。易言之「執委會」成員儘管有激烈的言詞交鋒或意見上的爭執，都隱喻這可能是 McCauley 所提出的「集體迷思」中，所謂的「高品質討論之摩擦」情境（the unpleasantness of high quality discussion）。¹⁵亦即此一激進性之討論其實存在於以團體為榮或以任務為要的成員間。這說明了即使在高度凝聚力的團體中，針對事件做出激烈討論的情形仍舊存在。

註 11 請參考：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Deterrence and Cold War," pp. 157-181.

註 12 McCauley 與 Janis 對於古巴危機有無出現「集體迷思」之現象看法不盡相同，請參考：Clark McCauley, "The Nature of Social Influence in Groupthink: Compliance and Interna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7, No. 2 (1989), p. 255; and 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Ch. 6.

註 13 請參考：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Ch. 6.

註 14 Clark McCauley, "The Nature of Social Influence in Groupthink," pp. 254-255.

註 15 Clark McCauley, "Group Dynamics in Janis's Theory of Groupthink: Backward and Forwar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 73, No. 2/3 (Feb./March, 1998), p. 152.

其實，若從 Kennedy 透過錄音方式秘密紀錄「執委會」成員會議內容之事實觀之，則下列幾個問題多少暗示了「集體迷思」在古巴危機中的影響地位：（1）為何只有 Kennedy 與其胞弟知曉此一錄音事件？（2）由於錄音乃是由 Kennedy 主導，這是否暗示了從危機一開始 Kennedy 就想以秘密錄音的方式洗刷其在 1961 年豬灣戰爭失敗的無能形象？^⑩其實上述兩個問題大致可從 Kennedy 選擇故意不出席某些會議一事看出端倪。Kennedy 的作法乃是便於「執委會」成員能暢所欲言，但卻又指派 Robert Kennedy 在「執委會」討論過程中批駁其他成員所提出之論點。這凸顯言詞交鋒之境其實受到人為操控，某種程度上隱含了「集體迷思」存在的可能。^⑪

「集體迷思」對古巴危機的理論意涵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當「執委會」成員面臨高度戰爭風險時，易對 Khrushchev 所傳達之信息持高度敵意之傾向。無論是蘇聯初起的飛彈部署、Khrushchev 與 Gromyko 於古巴飛彈危機前否認在古巴設置飛彈的不實陳述、抑或 27 日傍晚華府得知 U-2 擊落事件，大部分成員或鬆動原先不動武的立場，或決心對蘇聯進行空襲報復。這意味小團體成員面對不確定信息時，易以「防禦性逃避」的思維面對決策。^⑫亦反映當遭受重大壓力時，決策菁英易採激進具敵意的行為模式。

第二、Kennedy 決定是否採納「執委會」建議之機制，仰賴後者對蘇方外交行動之預測有無抵觸蘇聯之實際行為而定。譬如 20 日受到中情局有關蘇方中程彈道飛彈已可運作之報告影響，Kennedy 一改先前執委會軍事懲罰手段的建言，轉而傾向海上封鎖政策；24 日蘇聯船艦於封鎖線前停航一事，透露並未有意願挑戰美方決心；Khrushchev 兩封傳達以非武力途徑解決古巴危機的方式；28 日直接透過莫斯科廣播接受美國和議的建議等，都使得 Kennedy 逐漸對「執委會」中主張軍事攻擊意見之強硬派失去信心。

這指涉智囊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其「影響力」有一定的局限性。^⑬也說明為何 Kennedy 面對 27 日的 U-2 擊落事件時，仍力主與蘇聯透過談判結束危機。^⑭由此觀之，儘管 Kennedy 如學界所稱與 Khrushchev 展開一場睿智爭鬥，但上述分析似乎暗示 Kennedy 英明與果敢的領袖形象可能過於渲染。這在 Weiner 所出版的書中解釋得極為

註⑩ 相關論述與爭辯，請參考：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and 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Ch. 1.

註⑪ Kennedy 之所以在古巴危機中引介不同背景之成員進入「執委會」，除了從豬灣戰爭中得到的教訓外，更重要的是防範軍方鷹派的意見主導外交決策。

註⑫ 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p. 148~189.

註⑬ 請參考：Diane Stone, "Introduction: Thank Tanks, Policy Advice and Governance," pp. 10~15.

註⑭ 當 LeMay 將軍得知 Kennedy 指示不得發動空對地飛彈以攻擊位於古巴之薩姆防空導彈基地時，LeMay 將軍咆嘯說道：「他再次膽怯了。」其原文如下："He chickened out again," LeMay growled. "How in hell do you get men to risk their lives when the SAMs are not attacked?"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 118.

詳盡。^⑭此外 Pious 則從史料中重新檢驗 Kennedy 在古巴危機中之表現，指出其隱密與蘇聯協商撤軍一事，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擔憂此一協商被國內批判成姑息主義；其二則是擷取其政治上之利益，亦即使美國民眾留下最危險的錯覺：「白宮有能力處理類似之強權核武危機」。^⑮事實上，上述二點亦或佐證學界與史家對 Kennedy 處理古巴危機時其英雄形象的質疑。

第三、雙方智庫或小團體成員若彼此意識形態差距過大，則其策略形塑之差異性將存在。亦反映在回應對手釋出的策略信息時，可能因認知差異而導致決策錯誤的情形。譬如「執委會」於危機初始，即出現關於不同策略論述的「強硬」與「溫和」兩派。^⑯然而，危機初期受到對蘇聯領導人過往侵略性印象的影響，「執委會」主張以軍事作先制（preemption）攻擊，這樣的情形亦反駁包括 Schlesinger 與 Janis 對古巴危機美方並未出現「集體迷思」的看法。^⑰

三、外交信息傳遞

此一概念涉及信息傳遞管道、信息本質及信息的類型三個面向。前者意味「正式」管道與「非正式」管道在古巴危機中的交互運用，尤以「非正式」溝通渠道在古巴危機過程中有程度上的影響地位；信息本質意指信息本身所傳達的「侵略性」與「真實性」之意圖。而類型則指涉「語言」與「非語言」信息在危機衝突過程中的關係。以下分別闡述之。

第一、「非正式」管道在古巴危機的關鍵影響，呼應 Jervis 關於秘密交往渠道於外交溝通中重要地位的主張。^⑱譬如，26 日晚間 7 時許，蘇聯公共事務參事 Fomin^⑲透過美國國家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電視新聞記者 Scali 見面傳遞信息給華府高層：蘇聯將撤離飛彈，但美方須保證不入侵古巴。Robert Kennedy 與 Rusk 考量 Fomin 的特殊地位，咸認為這是 Khrushchev 企圖透過新的「非正式」管道，傳達欲和平解決危機的重要信息。以此觀之，則 Kennedy 於 27 日 U-2 事件後仍致力於回應 Khrushchev 飛彈交換提議的決策行為，似乎是雙方秘密協議下的必然產物，

註⑭ 請參考：Tim Weiner,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Ch. 19. 值得玩味的是，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罕見的於 2007 年 8 月 6 日為文批駁這位普立茲獎得主的新書，認為其內容盡是誤解與錯用。反諷的是，曾受雇於 CIA 的 John Perkins 於 2004 年出版的經濟殺手的告白（*Confession of an Economic Hit Man*），書中對於美國政府利用 CIA 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親身描述，似乎間接向世人宣告 CIA 對 Weiner 文字攻擊的荒謬了。請參考：John Perkins,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New York: PLUME, 2004)。

註⑮ Richard M. Piou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Limits of Crisis Management," p. 97.

註⑯ 相關論述，請參考：Paul 't Har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Foreign Policy-making at the Top: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Ch. 1.

註⑰ 請參考：Arthur M.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pp. 295~297.

註⑱ 請參考：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38.

註⑲ 時任 KGB 華府站長。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 143.

而非英明領袖力抗強權之形象。^⑩此處說明外交信息溝通中，「非正式」管道對於解決危機僵局起著重要地位。

這是否意涵古巴危機從來不若外界之看法已危急至核戰爆發邊緣？^⑪很大程度上這一論述過於武斷。根據白宮錄音帶解密文件指出，當 U-2 事件爆發後，不但「執委會」鷹派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也含括溫和派諸如 Rusk、Ball 及 Dillon，都對飛彈交換一事持反對意見。中情局指出蘇聯正加速其在古巴的飛彈部署工程，顯示蘇方可能輕啓戰端。以此觀之，儘管雙方早在 26 日即以秘密從事協商飛彈交易事宜，Kennedy 仍擔憂危機失控的風險，故在信函中強調時間的緊迫性。^⑫此一行動間接說明戰爭幾近一觸即發。此信息所傳遞的意圖或許相當明顯：突發走火的事件，不該成為將危機從戰爭邊緣拉回的絆腳石。^⑬

第二、就信息之「侵略性」與「真實性」的理論意涵而言，似乎都指涉在古巴危機中外交信息與意圖常出現不一致的現象。譬如：Kennedy 於 18 日透過蘇聯外長 Gromyko 傳達美國不容蘇聯於古巴設置任何攻擊性武器之強硬意圖；22 日中午運用「預告」晚間將有重大事件宣布之方式，加深對手因等待而焦慮的恐懼，但卻轉交私函給 Khrushchev 傳遞希冀蘇方節制可能擴大危機的意圖；以及 24 日實施具信息不可逆與高度敵意的「海上封鎖」政策，卻於 25 日未經檢查即准許放行一艘不顧封鎖直駛古巴的蘇聯油船 Bucharest 號。^⑭

上述事實反映了恫嚇信息具有詭詐的本質，並希冀對手依己方原先預期方式解讀

註⑩ 是否 Kennedy 如傳統學者所稱具治國之大才之形象，一直都是學者在探究危機處理時，可能觸及的議題。然而，本文依據 Stern 的白宮譯文，Fursenko 和 Naftali 以及 Weiner 的資料比照下，傾向 Kennedy 並非如一般以為乃是不畏 Khrushchev 脅迫的英明之主。

註⑪ 並類似的看法。當然，Frankel 主張的原因更多傾向於：雙方於危機初始就各自掌握其國內政局，並使危機朝向遊戲的軌跡前進。請參考：Max Frankel, *High Noon in the Cold War: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Ballantine, 2004), Chs. 8 and 11.

註⑫ 最經典的插曲，當屬空軍將領 LeMay 私下抨擊 Kennedy 膽怯一事。事後 Kennedy 得知，他語重心長地表示對於未來繼任者的警語，就是別輕易相信軍方的建言。請參考：Sheldon M. Stern,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 pp. 371, 384–385.

註⑬ 以下是 Khrushchev 之子 Sergei Khrushchev 為其父立傳所記錄的文字。Khrushchev 對其外長 Gromyko 說到：「一旦總統宣布入侵（古巴），他就再也無法改變此一決定，我們必須讓他知道我們要幫助他（逃脫此一困境）。」此一資料透露雙方在戰爭邊緣相互拉距的高度危險性。其英文譯文如下：「Once the president announces there will be an invasion, he won't be able to reverse himself. We have to let Kennedy know that we want to help him.」請參考：Sergei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30.

註⑭ 相同的，Khrushchev 率先於古巴部署飛彈，展現高度不可逆之侵略性意圖，意圖造成既成事實以達核武權力平衡的戰略目標。卻於 22 日接受 Malinovsky 的建議，延後授權駐古巴的蘇軍司令 Pliyev 對美發動攻擊；蘇聯仍持續進行古巴導彈基地建設、並派遣船艦欲意挑戰美國的海上封鎖線，隨後卻要求原先預定前往古巴並載有 R-14 型導彈的船隊暫緩其前進古巴之行程，或立即返回蘇聯黑海基地，以及仍持續於古巴加緊建造飛彈基地的同時，卻於 26 至 27 日以私函與公開信之方式傳達欲和平結束危機的企圖。請參考：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Chs. 18 and 19.

信息。因此無論涉及「語言」或「非語言」信息，其重要意涵在於：(1) 一旦傳遞具高度攻擊性的信息，似乎亦會透過其他溝通管道向對方傳達不欲危機惡化的意圖。此種信息釋放的方式意味著，一方面決策者透過釋出以武力攻擊意味濃厚的外交信息，使對手因畏懼而退讓；另一方面其真實意圖卻是不願危機成為一場核戰浩劫。從此觀之，其意圖只是恫嚇對手，但其信息卻必須使對手相信己方有決心將威脅付諸實踐。

(2) 因恐懼遭受立即的武力攻擊，故採行強硬的回應策略。某種程度上，因懼怕受攻擊故以更具侵略性的方式回應，呼應了 Lebow 與 Stein 抑或 Orme 論述古巴危機時，對恫嚇理論的批判與看法。^⑫無論是蘇聯在古巴的飛彈部署、抑或美軍之海上封鎖行動，均屬於不可逆的「非語言」信息，亦是典型透過以攻擊威脅之行動進行操弄對手之恫嚇策略。弔詭之處在於恫嚇策略之所以失敗，即在於當面臨決策壓力，國家領導人與決策小組通常較傾向採取具敵意或攻擊的行動。亦即意圖可能是恫嚇或故作強硬姿態，但這信息之意義卻會令對手感受攻擊威脅已達相當高的急迫程度。此一行動或將導致對方加碼，使原先雙方希冀避免衝突的情事或有成為戰爭之可能。

第三、古巴危機中涉及「語言」與「非語言」兩種信息類型。很大程度上，行動信息經常透過軍事運作、外交肢體語言或活動傳達外交信息。而在危機過程中所採取關於「非語言」信息之作爲或不作爲、考量是否準備何種軍事武力之部署或警告，將使「語言」此類脅迫更具真實性。這反映 Schelling 關乎行動與言詞之論述，意即行動或許將強化外交語意中強而有力的言詞。^⑬這隱含下述觀點：若情勢險峻而無法以嚴厲之外交語言傳達給對手時，則可輔以「非語言」信息以便使對手得知我方不滿現狀的真實意圖。然而，在古巴危機中有時「非語言」信息的意圖其實相當模糊，甚至容易被對手視為一種虛張聲勢的外交恫嚇手段。此時，語言信息即可對「非語言」信息所欲傳達之意圖做出澄清、說明行動背後決心與承諾。

柒、結語

長久以來 1962 年的古巴飛彈危機被視為是冷戰時期中最爲嚴重的軍事對抗。學界對此一事件研究之相關論述實屬汗牛充棟，在國際衝突的領域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儘管如此，由於當年白宮會議錄音紀錄的重新轉譯謄寫、與前蘇聯關於 Khrushchev 決策之機密檔案問世，意謂學界關於此危機的分析與解釋，仍有待解密文件的重新斟酌、詮釋，以盡力趨近當時可能的真實圖像。

儘管既存文獻大多透過諸如決策過程、恫嚇或危機管理等不同理論面向分析此一經典個案，本文認為上述觀點共同指涉外交信息此一相對重要卻被忽略的議題。有鑑

註⑫ 值得注意的是，Lebow 與 Orme 對恫嚇理論失敗原因的見解不同。請參考：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Deterrence and Cold War," pp. 157-181; and John Orme, "Deterrence Failures," pp. 97-124.

註⑬ 請參考：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 117.

於此，吾人提出外交信息傳遞此一研究途徑，透過重新審視古巴危機解密檔案，建議古巴危機中之決策模式，應以解讀國際情境的因素、菁英互動及信息傳遞等三個彼此互動之範疇做為分析主軸。如此不僅反映外交信息傳遞之動態機制，解析何時 Kennedy 會推翻「執委會」對古巴發動軍事攻擊的建議，亦透露古巴危機由於雙方對於信息的慎重解讀，最終能由戰爭邊緣回復平和狀態。

本文說明國際情境如何影響決策菁英的策略模式，並因而對敵手的外交信息做出相對應的回應。吾人所提出的兩個情境因素（「威脅的認知」與「受辱的恐懼」）其彼此間之相互作用，對「執委會」成員與 Kennedy 關乎不同外交信息傳遞之決策有著重要影響。此外，本文對 Fearon 於 1997 年提出的混合策略所出現之理論缺口作出解釋，重新修正其對混合信息和「可信度」彼此過於晦澀的聯結。並主張兩個可由外交信息釋出國所操控之向度：信息「真實性」與「侵略性」，以探究 1962 年古巴危機之信息傳遞過程。更透過新近史料，本文建構於 McCauley 對於「高品質討論之摩擦」此一概念之上，重新修正 Janis 對於古巴危機「集體迷思」之看法。亦即本文主張儘管「執委會」成員彼此間出現激烈的言辭交鋒，但似乎不足以合理化古巴危機中不存在「集體迷思」的現象。

本文亦點出國際衝突研究領域中所涉及的信息傳遞之「意義」、「意圖」及「動機」等重要議題。是否蘇聯於 2008 年對喬治亞所發動的攻擊入侵，透露其意欲以武力恫嚇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節制北約將勢力擴展至東歐之意圖？是否 2010 年美國與南韓於黃海區域聯合軍演，乃是向北韓傳達對天安艦事件的恫嚇性之「非語言」信息？中國東海艦隊宣布於 2010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將在東海實施軍事演習，是否傳達警告美、韓軍演的威脅信息？上述事件透露出：如何評估對手外交姿態與行動，與避免因時間壓力而陷入「集體迷思」等課題，持續對面臨危機時的決策菁英帶來困難與挑戰。

*

*

*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 Diplomatic Signaling Perspective

Ming-Chen Sh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s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events of the Cold War, has continued to attract academic attention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especially with the release of new evidence in the Kennedy tapes that presents researchers with insights as well as puzzles. Nevertheless, few, if any,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is historic event from a diplomatic signaling perspective. The signaling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risis resolution posits that in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 state disseminates verbal and/or nonverbal signals, carrying diplomatic objectives, to its opponents. In a sense, every signal or countersignal sent by the decision maker connotes strategic intention or reactions to the adversary's signals. In this study, incidents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ontext, elite decision-making, and diplomatic signal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political elite of the U.S. interacted, in a groupthink manner, to perceive the contextual factors, decipher the USSR's signals, and make signaling decisions in response to competitive mov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have implications for signaling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Keyword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 diplomatic signaling, international context, elite decision-making, Groupthink

參考文獻

- 林正義,「從危機處理分析布希總統的波斯灣戰爭決策」,歐美研究,第22卷第3期(1992年9月),頁23~65。
- 林正義,「論危機處理原則:以中、美經驗為例」,中山學術論叢,第12期(1994年6月),頁143~167。
- 林正義,「『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美國預防台海危機的政策辯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1期(2007年1月),頁1~51。
- 裘兆琳(編),美國外交與危機處理(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3年)。
- 鄭偉,國際危機管理與信息溝通(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
- 賽明成、陳建維,「紮根理論與質性研究:調和觀點」,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2010年3月),頁1~28。
- Allison, Graham T.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99).
- BBC, "Putin Shoots Siberian Tiger," <http://news.bbc.co.uk/2/hi/7591456.stm>. (2008.9.1).
- Brecher, Michael, *Crises in World Politics: Theory and Reality* (New York: PERGAMON, 1993).
- Cohen, Raymond, *Theatre of Power: The Art of Diplomatic Signaling*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 Fearon, James D.,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1997), pp. 68~90.
- Ferguson, Niall, "History Lesson for Economists in Thrall to Keynes," <http://www.ft.com/cms/s/0/a635d12c-4c7c-11de-a6c5-00144feabdc0.html#axzz19lqHYj5v>. (2009, 5. 29)
- Frankel, Max, *High Noon in the Cold War: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Ballantine, 2004).
- Friedland, Nehamia and Ariel Merari,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errorism: A Double-Edged Swor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6, No. 4 (1985), pp. 591~604.
- Fursenko, Aleksandr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Fursenko, Aleksandr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 George Alexander L.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George, Alexander L.,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 George, Alexander L., "From Groupthink to Contextual Analysis of Policy-making Groups,"

- in Paul't Har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eds.), *Beyond Groupthink: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35~54.
- George, Alexander L., "Coercive Diplomacy," in 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N. Waltz (eds.),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p. 70~76.
- Guisinger, Alexandra and Alastair Smith, "Honest Threats: The Interaction of Reput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2 (2002), pp. 175~200.
- Hair, Oliver P. and Thomas S. Robertson, "Toward a Theory of Competitive Market Signaling: A Research Agend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2, No. 6 (1991), pp. 403~418.
- Hart, Paul'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Foreign Policy-making at the Top: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in Paul't Har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eds.), *Beyond Groupthink: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Ch. 1.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Huth, Paul and Bruce Russett, "Testing Deterrence Theory: Rigor Makes a Difference," *World Politics*, Vol. 42 (1990), pp. 466~501.
- Huth, Paul,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Khrushchev, Sergei, *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Janis, Irving L.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 Janis, Irving L.,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 Jervis, Robert,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uildford, Surr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Lebow, Richard Ned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ebow, Richard Ned and Janice Gross Stein, "Deterrence and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0, No. 2 (1995), pp. 157~181.
- May, Ernest R.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cCauley, Clark, "The Nature of Social Influence in Groupthink: Compliance and Interna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7, No. 2 (1989), pp. 250~260.
- McCauley, Clark, "Group Dynamics in Janis's Theory of Groupthink: Backward and Forwar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 73, No. 2/3 (Feb./March, 1998), pp. 142~162.
- Mercer, Jonathan,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oore, Marian Chapman, "Signals and Choices in a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The Role of Moves and Messages," *Management Sciences*, Vol. 38, No. 4 (1992), pp. 483~500.
- Moreland, Richard L. and John M. Levine, "The Composition of Small Groups," in E. Lawler, B. Murkovsky, C. Ridgeway, and H. Walker, (ed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9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003), pp. 237~280.
- Perkins, John,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New York: PLUME, 2004).
- Pious, Richard M.,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Limits of Crisis Man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1 (Spring, 2001), pp. 81~105.
- Prabhu, Jaideep and David W. Stewart, "Signaling Strategies in Competitive Interaction: Building Reputations and Hiding the Truth,"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 38, No. 1 (2001), pp. 62~72.
- Press, Daryl G.,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ress, Daryl G., "The Credibility of Power: Assessing Threats during the 'Appeasement' Crises of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4/5), pp. 136~169.
- Orme, John, "Deterrence Failures: 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 No. 4 (1987), pp. 97~124.
- Reynolds, Paul, "Test for a New 'Cold War' in Crimea," *BBC News*, August 27, 2008,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7583810.stm>, (2008. 8.27).
- Sartori, Anne E., *Deterrence by Diplo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chelling, Thomas,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Schlesinger, Arthur M.,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 Smith, Alastair,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3 (1998), pp. 623~638.
- Snyder, Glenn H.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Steingart, Gabor, "Learning from Kennedy," Spiegel Online,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0,1518,572973,00.html>. (2008.8.19)

Stern, Sheldon M., "Source Material: The 1997 Published Transcripts of the JFK Cuban Missile Crisis Tapes: Too Good to Be Tru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 3 (Sep., 2000), pp. 586~593.

Stern, Sheldon M.,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 John F. Kennedy and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Meeting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tern, Sheldon M.,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Inside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one, Diane, "Introduction: Thank Tanks, Policy Advice and Governance," in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8.

Vogler, John, "Perspectives on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 Michael Clarke and Brian White (eds.), *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y: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s Approach*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89), pp. 135~162.

Weiner, Tim,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